

# 中国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研究

董延芳<sup>1</sup> 张则月<sup>2,3</sup>

(1.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3.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 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潜在的交互影响对人们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利用2014年全球创业观察的中国数据,探寻我国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的特点,发现专用人力资本、普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高的人都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普通人力资本还调节了专用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但普通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作用关系的调节则未得到证实,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对我国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也许发挥了更加独立的作用。

**[关键词]** 创业;机会识别;专用人力资本;普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9.06.006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9)06-0057-11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阶段,这一快速变化的过程酝酿了大量创业契机,涌现了大批创业者。自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政府近年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以良好的创业氛围催生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据全球创业观察(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统计,2017年除学校创业教育(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at School Stage)、商业和法律基础设施(Commercial and Legal infrastructure),我国的国家创业框架专家评级(Expert Ratings of the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Framework)各指标均高于或等于亚洲和大洋洲的平均水平;另外,关于创业的社会价值(Societal Value About Entrepreneurship),我国认为创业是一项好的职业选择(Entrepreneurship a good career choice)的样本比例为66.4%,认为创业者享有较高社会地位(High status to entrepreneurs)的样本比例为74.6%,在调查涉及的5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6位(GERA, 2018)<sup>[1]</sup>。

创业作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在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帮助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代际分化的农民工集体行动研究”(14CJL0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问题研究”(16JJD790044)

**[作者简介]** 董延芳(1980—),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

国的部分劳动者解决了就业问题。各地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过程中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鼓励以自主创业带动个体就业的方式来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迄今,创业者如何成功实现创业的问题日益重要,而创业的核心在于创业机会,创业者对创业机会是否有正确的认识、理解与把握,关乎创业能否成功(斯晓夫等,2016)<sup>[2]</sup>。容易理解的是,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部分来自外界环境和条件,如创业机会客观存在的数量多寡,这部分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平和阶段,又如政府对人们创业和创业机会识别活动的支持,这同样部分取决于社会经济现实的状况,但又更多地与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和目标有关。然而,对同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者,当面临基本一致的外界环境和条件,他们为何依然会在创业机会的识别上呈现不同?来自创业者自身的个体差异理所当然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鉴于在年龄、性别等基本个体差异之外,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常是影响个体行为和行为绩效的最重要个体差异,对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应在其诸影响因素中占据重要一席。此外,人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往往存在相互影响,国内外许多成功的MBA和EMBA教育就是其例证,而如果这一交互作用在理论上成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就会更加复杂。本文研究中国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并假定他们面临一致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以此为前提,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尤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潜在的交互影响对人们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尝试探寻我国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的特别之处,以期深化和完善相关理论,并为我国创业者的创业实践助力。

## 二、背景和文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位居全球创业活跃度较高的国家之列,如在2017年,我国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EA)为9.9%,虽然低于美国(13.6%)和韩国(13.0%),但高于许多欧洲国家如英国(8.4%)、德国(5.3%)和法国(3.9%),并且也高于印度(9.3%)(GERA, 2018<sup>[1]</sup>)。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创业环境的持续改善,我国的早期创业活动逐渐转向以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Driven)为主,2005年50.0%-55.0%的早期创业活动为机会型,2017年66.0%的早期创业活动为机会型,比例提升不少,但2017年美国韩国的机会型创业在早期创业活动中的占比分别为86.2%和76.1%,我国和美国、韩国的差距仍然不小(GERA, 2018<sup>[1]</sup>)。在此现实背景下,对我国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正如Shane和Venkataraman(2000)<sup>[3]</sup>指出:要创业,你必须首先有创业机会;创业机会未必是所有人总是知道的客观现象。

鉴于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关于其定义和内涵。Bandura(1978)<sup>[4]</sup>提出,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者对机会的感知并通过创建组织来追寻机会。Stevenson和Jarrillo-Mossi(1986)<sup>[5]</sup>认为,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者整合资源并创造价值的能力。Ardichvili(2003)<sup>[6]</sup>等将创业机会识别定义为创业者个体将一些有关创业的想法、元素进行塑造、加工,以致逐渐发展成全面商业计划的过程。林嵩等(2005)<sup>[7]</sup>则提出,创业机会的识别过程囊括了大部分研究中提到的机会发现、机会鉴别、机会评价等创业活动。本文综合这些文献的观点,将创业机会识别定义为创业者利用自身资源挖掘出有价值的创业机会。

除了创业机会识别的定义和内涵,学界近年的许多研究还关注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Ardichvili<sup>[6]</sup>等认为创业机会识别受多方面影响,包括创业警觉性、非对称信息与先验知识、社交网络、人格特质以及机会类型本身。林嵩等(2005)<sup>[7]</sup>则认为创业者的警觉性、风险感知、自信、先验知识和社会关系网络都影响其创业机会识别,并说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事实上,在创业机会识别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一点上,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研究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这些因素的分类归纳方面。但无论在哪一种分类归纳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占据重要一席,如上文提到的属于人力资本的先验知识和属于社会资本的社交网络、社会网络关系等。就人力资本而言,创业者从学历和以往工作经历中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构成了其自身的“知识走廊”,它影响了创业者能否成功搜索和决定利用一个正确机会的概率(Venkataraman,1997)<sup>[8]</sup>。关于这一点,Shane(2000)<sup>[9]</sup>进一步指出,是先验知识造就了创业者的“知识走廊”,帮助创业者解读出与先验知识密切相关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创业机会开发的可能。Davidsson和Honig(2003)<sup>[10]</sup>提出,有更多或更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个体更能感知有利可图的创业机会,在成功利用创业机会方面具有更超群的能力,并且,他们对自主创业的选择也有更大的自信。由此可见,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关键因素之一。至于社会资本,由于创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网络活动(Brüderl和Preisendörfer,1998)<sup>[11]</sup>,以社会网络为承载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创业者的资源积累,从而提升其对创业机会的发现概率和对风险的认知程度,使创业机会开发更具可行性。其中,社会网络是指个体成员通过与团队成员交往和互动建立的稳定关系(陈寒松等,2017)<sup>[12]</sup>,个体将社会网络得以工具性地应用并使其产生一定价值时,社会网络便转化成社会资本(汪忠等,2017)<sup>[13]</sup>。Davidsson和Honig(2003)<sup>[10]</sup>提出,当和知识渊博、有声望的人建立联系,创业者将因此获得知名度和信息,推动其创业机会识别的进展。张浩和孙新波(2017)<sup>[14]</sup>发现社会资本能够带来丰富的信息与资源,其中,网络规模、网络资源对创业机会识别有正向影响。Fiet(1996)<sup>[15]</sup>则认为创业个体可将社会网络作为获取创业机会风险信息的重要渠道。由此,社会网络进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上述研究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实。首先,许多研究者已经讨论过人力资本对创业者机会识别的影响,学界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分类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涉及,但往往忽视了这些不同分类的人力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其次,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给创业者机会识别带来的影响也进行了许多探讨,但关于其和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尤其和不同分类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则少有涉及。事实上,创业者的学历水平以及直接与创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影响着他们的创业机会识别(Ramos-Rodríguez等,2010)<sup>[16]</sup>,但从特定用途考虑,人力资本有专用性高低之分。如果将和创业高度相关的人力资本定义为“专用人力资本”,如直接与创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将和创业非高度相关的人力资本定义为“普通人力资本”,如创业者的学历水平,那么,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假设是——普通人力资本对人们创业机会识别的直接影响较弱,但其可能在专用人力资本对人们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中施加某种间接作用,而在社会资本对人们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中,普通人力资本可能也扮演同样角色。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检验,以期补充和完善创业机会识别理论,并就中国情境讨论我国创业

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一)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

按前文定义,以下将人力资本区分为专用的和普通的,并依次就专用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普通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直接作用、普通人力资本在专用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的间接作用展开讨论。

1.专用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创业者往往倾向于基于自身掌握的有关创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识别创业机会,因为这往往会增强他们的信心和成功率(Clercq 和 Arenius,2006)<sup>[17]</sup>。Baron(2006)<sup>[18]</sup>认为:机会识别依赖于个体的认知图式,包括个体的先验知识和创业经验所形成的原型、样例等,当遇到技术、市场和政府等的变化时,他们会将这些外界变化根据认知图式进行比较来识别机会;有创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擅于识别看似独立事件之间的联系或发展趋势,并通过把许多外部因素结合成有意义的模式来识别新的商业机会,他们还擅于利用自身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识别到潜在的有利创业机会。为此,本文提出假设1:专用人力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

2.普通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直接作用。Bygrave 和 Hofe(1991)<sup>[19]</sup>认为,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影响着创业的可能性。Shane 和 Venkataraman(2000)<sup>[3]</sup>论证了机会识别过程中知识储备量的重要性,认为这些知识创造了一种更有利于正确处理新信息的心智模式,从而促进机会识别。王沛、陆琴(2015)<sup>[20]</sup>认为,创业大学生对创业活动有强烈的价值感,他们对与商业环境有关的信息和事件更感兴趣,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在脑中形成某种认知的框架具有特异性和专业性,当遇到一些模糊情境或偶然事件时,这种特异性和专业性会自动提供一种判断、辨别的框架或线索,有利于形成与创业相关的较为清晰、完整的商业机会认知框架。也有学者提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有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为创业行为创造出好的想法(Arenius 和 Clercq,2005)<sup>[21]</sup>,而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所储备的知识能带来预期的成功时,那么机会识别的可能性机会增加(Clercq 和 Arenius,2006)<sup>[17]</sup>。为此,本文提出假设2:普通人力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

3.普通人力资本在专用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的间接作用。高的受教育水平为创业者提供多种类型的知识从而有助于其识别出创业机会,而广泛的知识基础也增加了将这些知识与潜在机会联系起来的可能性(Cohen,1990)<sup>[22]</sup>,而这些知识不局限于普通人力资本,往往还包括直接和创业相关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专用人力资本。进一步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或许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创业知识、技能和经验获取和掌握的效率,进而影响到创业者对机会的识别情况。具体而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给予了创业者一定的知识积累,能培养其处理新信息的心智模式,也能增强其组合资源的能力等,这很有可能使创业者具备更强的创业自信,也可能更擅于通过对先前创业经历中的相关知识、经验和技术的运用,挖掘出潜在的市场信息价值以识别出创业机会。为此,本文提出假设3:普通人力资本调节专用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

#### (二)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



前文已概述了社会资本对人们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并提及普通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可能影响。以下分别就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和普通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的间接影响展开论述。

1. 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有获得信息和各种机会的特权(Nahapiet 和 Ghoshal, 1998)<sup>[23]</sup>,置身其中的创业者能由此获得大量有价值的资源(Reynolds, 2009)<sup>[24]</sup>,创业者可以利用嵌入在网络中的优势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并增强自己的信心,这将有损于创业(Bandura, 1978)<sup>[5]</sup>。此外,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接触到的信息和机会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越能进行有效的机会识别(Lin, 2001)<sup>[25]</sup>。换句话说,创业者与他人形成的关系范围和质量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关键资源的获取,拥有更高社会资本的创业者通常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源,识别出创业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Singh, 2000)<sup>[26]</sup>。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4: 社会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

2. 普通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的间接作用。一如此前假设 3 的提出,普通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的间接作用也应被充分考虑。Arenius 和 Clercq(2005)<sup>[21]</sup>在解释高学历的人比低学历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时提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有价值知识的获得来提高创业机会识别的可能——例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认识更多能提供有价值知识的人,并可能更善于察觉和利用他们的价值所在,由此,教育可以提供与创业机会知识中相辅相成的新知识,从而增强机会识别的可能性——这显然也显示了普通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作用的调节。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5: 普通人力资本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

#### 四、数据和方法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使用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该数据库基于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创业活动的跟踪调查,提供长达 18 年的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活动数据。结合研究目的,本文主要使用该数据库于 2018 年 2 月最新公布的 2014 年成年人口调查全球个人水平数据(GEM 2014 APS Global Individual Level Data),并将考察样本限定于中国创业者,其样本总量为 3647。

鉴于前述假设涉及样本的创业机会识别、普通和专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结合数据条件,本文的变量选取如下:(1)创业机会识别变量 oppo 对应 Qi2 问题“在接下来的 6 个月中,您生活的地方存在好的创业机会吗”(In the next six months, will there be good opportunities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in the area where you live?),删除拒绝回答的样本(Refused)和回答“不知道”的样本(Don't know),将持否定(No)和肯定(Yes)回答的样本分别代表“未识别创业机会”(oppo=0)和“识别创业机会”(oppo=1)。另考虑到如前所述我国良好的创业环境与氛围<sup>[1]</sup>,此处假设好的创业机会普遍存在而有待识别。(2)普通人力资本变量 ghe 对应 UNEDUC 条目即“UN 统一学历”(UN harmonized educational attainment),删除缺失样本(Missing),将余下样本中的“小学以下”(Pre-primary education)、“小学”(Primary education or first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初中”(Lower secondary or second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合并为“初中及以下”并赋值为 0,将“高中”(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以上非高等教育”(Post-secondary non-

terti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合并为“高中及以上”并赋值为 1。(3)专用人力资本变量 shc 对应 Qi3 问题“您拥有创业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吗”(Do you have the knowledge, skill and experience required to start a new business?),删除拒绝回答的样本(Refused)和回答“不知道”的样本(Don't know),将持否定(No)和肯定(Yes)回答的样本分别代表“无专用人力资本”(shc=0)和“有专用人力资本”(shc=1)。(4)社会资本变量 sc 对应 Qi1 问题“你自己认识在过去 2 年里创业的人吗”(Do you know someone personally who started a business in the past 2 years?),删除拒绝回答的样本(Refused)和回答“不知道”的样本(Don't know),将持否定(No)和肯定(Yes)回答的样本分别代表“无社会资本”(shc=0)和“有社会资本”(shc=1)。这主要是因为该条目考察样本同创业者的接触,即样本的人际关系中是否存在创业者,而这可被视为与创业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反映<sup>[11]</sup>。

但出于研究的方便,本文设置专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联合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即 shc\_sc。这主要是考虑到本文使用 Process 程序检验前述假设,这避免了常规方法在处理带有控制变量的调节效应模型方面的不足,但该方法在多个自变量的同时检验上存在局限。变通的做法是,令 shc\_sc=1 代表样本无专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情况(shc=0, sc=0),shc\_sc=2 代表样本无专用人力资本但有社会资本的情况(shc=0, sc=1),shc\_sc=3 代表样本有专用人力资本但无社会资本的情况(shc=1, sc=0),shc\_sc=4 代表样本有专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情况(shc=1, sc=1)。此外,文献部分曾提及,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人们的创业机会识别还受到很多其他方面个体特征的影响。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本文不打算对这些其他影响因素进行讨论,但年龄(age)和性别(gend)这两个最常见的个体特征变量除外。其中,年龄和其平方将共同作为控制变量,以考察年龄效应是否具有驼峰形态(Deaton,1997)<sup>[27]</sup>,逻辑是个体内在的发展和成熟(Glenn,1977)<sup>[28]</sup>也许导致中年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诸变量的描述见表 1,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2899。

表 1 变量描述 (n=2899)

变量	含义	注释	均值	标准差	百分比
oppo	创业机会识别	0=未识别创业机会	0.33	0.469	67.4
		1=识别创业机会			32.6
ghc	普通人力资本	0=初中及以下	0.64	0.479	35.8
		1=高中及以上			64.2
shc	专用人力资本	0=无专用人力资本	0.34	0.473	66.3
		1=有专用人力资本			33.7
sc	社会资本	0=无社会资本	0.56	0.496	43.9
		1=有社会资本			56.1
shc_sc	专用人力资本_社会资本	1=无专用人力资本,无社会资本	2.24	1.202	36.7
		2=无专用人力资本,有社会资本			29.6
		3=有专用人力资本,无社会资本			7.2
		4=有专用人力资本,有社会资本			26.5
age	年龄	18-64 岁	38.65	12.332	-
gend	性别	0=女性	0.50	0.500	49.6
		1=男性			50.4

表 2 列出了自变量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矩阵。结果显示,各自变量的相关系数都较小或不显著,这排除了多重共线的可能。

表 2 自变量相关系数 (n=2827)

	1	2	3	4	5	
1	shc	1.000				
2	sc	0.324 **	1.000			
3	ghc	0.068 **	0.138 **	1.000		
4	age	-0.040 *	-0.080 **	-0.290 **	1.000	
5	gend	0.085 *	0.076 **	0.019	0.034	1.000

注：\* \* 表示在置信度 (双测) 为 0.01 时相关性显著，\* 表示在置信度 (双测) 为 0.05 时相关性显著。

图 1 给出了回归模型 (未含控制变量)。表 3 提供了模型中虚拟变量  $D_1$ 、 $D_2$  和  $D_3$  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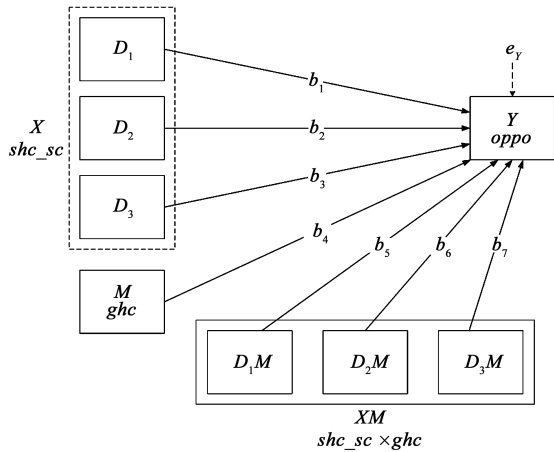


图 1 回归模型

表 3 虚拟变量

shc_sc	$D_1$	$D_2$	$D_3$
1.00	0.00	0.00	0.00
2.00	1.00	0.00	0.00
3.00	0.00	1.00	0.00
4.00	0.00	0.00	1.00

表 4 回归结果 (n=2827)

oppo	系数 b	标准误 se	优势比 expb
常数	-1.5533 ***	0.2176	-
age	-0.0091 **	0.0037	0.9909
gend	0.0429	0.0856	1.0438
ghc	0.3595 **	0.1797	1.4326
$D_1$	0.7033 ***	0.2019	2.0204
$D_2$	0.5834 **	0.2899	1.7921
$D_3$	2.1292 ***	0.1996	8.4081
$D_1 \times ghc$	0.2125	0.2434	-
$D_2 \times ghc$	0.6098 *	0.3625	-
$D_3 \times ghc$	-0.3435	0.2412	-

注：\* =  $p < 0.1$ ，\* \* =  $p < 0.05$ ，\* \* \* =  $p < 0.01$ 。

五、结果与分析

表 4 给出了回归结果，交互作用亦通过了似然比检验 ( $\text{Chi-sq} = 9.9354$ ,  $\text{df} = 3.0000$ ,  $p = 0.0191$ )。首先,就控制变量而言,(1)当引入年龄的平方,所有年龄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年龄效应不具驼峰形态,故而表 4 仅列出包含年龄一次项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越年轻的样本越容易识别创业机会,而非以“年富力强”为典型特征的中年样本。(2)性别的系数则不显著,这颠覆了以往的认识——例如,谢觉萍和王云峰(2016)<sup>[29]</sup>认为,机会识别与创业女性的需求和价值观相对应,女权主义思想贯穿整个机会识别过程并影响机会判断;刘鹏程等(2013)<sup>[30]</sup>认为,当女性为实现自我理想进行机会型创业时,往往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这导致了机会型创业率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然而事实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曾有所加深(蔡禾和吴小平,2002)<sup>[31]</sup>,但我国曾是世界上通过政党和行政力量推动妇女就业、基本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少数国家之一,至今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较高(武中哲,2008)<sup>[32]</sup>,并且我国社会的性别分工平等意识强于美国(朱斌和李路路,2015)<sup>[33]</sup>。考虑到本文使用是新近年份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上述结果或许反映了我国日益改善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其次,就核心自变量而言,(1)表 4 显示 ghc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假设 2 通过了检验,即

普通人力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2)虚拟变量  $D_1$ 、 $D_2$  和  $D_3$  的系数也为显著为正,根据表 3 可知,这表明假设 1 和假设 4 也通过了检验,即专用人力资本高的人和社会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3) $D_1 \times ghc$  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假设 5 没有通过检验,即普通人力资本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未得到证实。(4) $D_2 \times ghc$  的系数显著,表明假设 3 通过了检验,即普通人力资本调节了专用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5) $D_3 \times ghc$  的系数不显著,结合被检验通过的假设 3 即普通人力资本调节了专用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这也许进一步表明了假设 5 存在的问题。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基于我国作为转型经济体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史达,2011)<sup>[34]</sup>,社会资本对人们的创业机会识别发挥了更加独立的作用。

当进一步研究调节效应的作用模式,表 5 列出了简单斜率分析的相关结果,表明对普通人力资本不同的个体,专用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都是正向影响,但影响大小不同,其在普通人力资本高的组更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更擅长于从“干中学”中获得专用人力资本并将其与创业活动联系,引发对创业的更高关注和对创业机会的更高识别。

表 5		简单斜率	
条件效应		ghc	
		0=初中及以下	1=高中及以上
$D_2$		0.5834 **	1.1932 ***

注: \* = $p<0.1$ , \*\* = $p<0.05$ , \*\*\* = $p<0.01$ 。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前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专用人力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普通人力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社会资本高的人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普通人力资本调节专用人力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拥有创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受教育程度高,或拥有与创业相关的社会资本,这些均有助于人们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并且,在同样拥有创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识别创业机会。这在实践中则意味着,一方面,对于创业者,在积累创业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及社会资本的同时,不应忽略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应充分利用普通人力资本、专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抓住市场机会,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为更好地吸引具备创业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及社会资本的高学历人才积极投身创业活动,应予以充分的政策支持,打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的相对回报。

鉴于普通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作用关系的调节未在本文得到证实,倘若不存在数据代表性问题,若其真实原因的确是社会资本对人们的创业机会识别在中国情境下能发挥更加独立的作用,那么这将意味着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业者社会资本的提升上会事半功倍。由此,从创业者自身来讲,应积极利用社会网络获取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并在网络扩大和联系强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对其管理运用和探索挖掘的能力。就地方政府而言,则应引入企业家和多种参与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体制,培育互动网络(张玉利等,2008)<sup>[35]</sup>同时也应加强监督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避免社会资本流于传统语境中的“关系”(翟学伟,2009)<sup>[36]</sup>,导致对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利,遏制社会创新活力。



鉴于本文显示年龄效应不具驼峰形态,而是越年轻的创业者更容易识别创业机会,政府应鼓励年轻人发挥优势积极创业,对年长的创业者则采取提升其普通和专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针对性措施。可以考虑通过差异化的创业政策引导和帮助创业者,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这将解决退休年龄延迟后许多老年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对缓和部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也将有所裨益。

在一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力参与不仅关系到女性自身的福利和发展,衡量了女性社会地位,也对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张翔,2017)<sup>[37]</sup>。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女性一般需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无形中为女性的职业发展设置了“天花板”,但随着我国经济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努力突破这层职业“天花板”(万伟等,2017)<sup>[38]</sup>。近年来,女性创业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女性创业逐渐成为社会与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杨静、王重鸣,2016)<sup>[39]</sup>。本文虽然没有证实性别对人们创业机会识别的显著影响,但和其他创业者一样,女性创业者也应努力提升自身的普通和专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已成功创业的女性还可以通过自身事例影响和改变身边的女性,这都将有助于女性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获得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改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政府则可通过在高等教育和在职培训中加入更多与女性创业有关的内容以提升女性的普通和专用人力资本水平,并建立健全职场中有关性别歧视的立法規制和司法救济,让女性能站在更广阔的职业和社会舞台以缩小两性的社会资本差异,促进女性在就业创业的领域范围和层次水平上进一步提升。

#### 参考文献:

- [1] Monitor G E. Global report 2017/18[R].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Resecnch Association( GERA ), 2018.
- [2] 斯晓夫,王颂,傅颖. 创业机会从何而来:发现,构建还是发现+构建?——创业机会的理论前沿研究[J]. 管理世界,2016,(03): 115-127.
- [3] Shane S, Venkataraman S.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1): 217-226.
- [4] Bandura A. Reflections on self-efficacy[J]. Advanc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herapy, 1978, 1(04): 237-269.
- [5] Stevenson H H, Jarrillo-Mossi J C. Preserving entrepreneurship as companies grow[J].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1986, 7(1): 10-23.
- [6] Ardichvili A, Cardozo R, Ray S.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1): 105-123.
- [7] 林嵩,姜彦福,张炜. 创业机会识别:概念、过程、影响因素和分析架构[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06): 128-132.
- [8] Venkataraman S. The distinctive domain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Adva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1997, 3(1): 119-138.
- [9] Shane S. Prior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0, 11(04): 448-469.
- [10] Davidsson P, Honig B. 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03): 301-331.

[11] Brüderl J, Preisendörfer P. Network support and the success of newly founded business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98, 10(03): 213-225.

[12] 陈寒松, 陈宣雨, 林晨. 创业学习与创业意向的关系: 社会网络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7, (05): 28-33

[13] 汪忠, 李姣, 袁丹. 社会创业者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02): 140-148.

[14] 张浩, 孙新波. 网络嵌入视角下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12): 133-147.

[15] Fiet J O. The informational basis of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96, 8(06): 419-430.

[16] Ramos-Rodríguez A R, Medina-Garrido J A, Lorenzo D, Ruiz-Navarro J. What you know or who you know?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10, 28(06): 566-582.

[17] Clercq D D, Arenius P.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business start-up activity[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06, 24(04): 339-358.

[18] Baron R A.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s pattern recognition: How entrepreneurs “connect the dots” to identify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6, 20(01): 104-119.

[19] Bygrave W D, Hofe C W. Theorizing about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1, 16(02): 13-22.

[20] 王沛, 陆琴. 创业警觉性、既有知识、创业经历对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J]. 心理科学, 2015, (01): 160-165.

[21] Arenius P, Clercq D D. A network-based approach o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03): 249-265.

[22]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01): 128-152.

[23]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02): 242-266.

[24] Reynolds P D. Soci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cepts and contribution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16(02): 47-70.

[25]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 Singh R P.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27] Deaton A.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8] Glenn N D. Cohort analysis: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7.

[29] 谢觉萍, 王云峰. 创业女性机会识别与创业过程管理多案例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04):

144-148.

[30]刘鹏程,李磊,王小洁.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基于创业动机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3,(08):126-135.

[31]蔡禾,吴小平.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J].管理世界,2002,(09):71-77.

[32]武中哲.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外中比较[J].经济学家,2008,(02):116-121.

[33]朱斌,李路路.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J].社会,2015,(05):218-240.

[34]史达.关系、面子与创业行为:社会资本视角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03):34-40.

[35]张玉利,杨俊,任兵.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2008,(07):91-102.

[36]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J].社会,2009,(01):109-121.

[37]张翔.经济发展与女性劳动力参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06):31-37.

[38]万伟,姜思云,何建国.女性高管、内外部环境与企业绩效[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07):58-66.

[39]杨静,王重鸣.基于多水平视角的女性创业型领导对员工个体主动性的影响过程机制:LMX的中介作用[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01):63-71.

(责任编辑:杨磊)

## An Analysis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DONG Yanfang<sup>1</sup>, ZHANG Zeyue<sup>2,3</sup>

(1.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conomic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3.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ir potential interaction effects on people'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using China data from 2014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who have higher special human capital, higher general human capital and higher social capital are more likely to identify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general human capital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 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Howe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eral human capit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has not been confirmed, which probably means that social capital plays a more independent role in identify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entrepreneur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Special human capital; Gener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